

美国奴隶叙事研究

方小莉

[摘要] 奴隶叙事历经了漫长的时间检验,最终被经典化,成为了能够代表非裔美国文学起源与传统的独特文类。美国奴隶叙事在国内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国内尚未有文章较为全面地对美国奴隶叙事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从符号叙述学的角度出发,通过探讨奴隶叙事的产生与发展、体裁、文本与伴随文本以及影响等方面,试图对奴隶叙事进行较全面的介绍与分析。

[关键词] 美国奴隶叙事;源起;体裁;影响;文本;伴随文本

中图分类号: I10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6)09—0189—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奴隶叙事研究”(13BWW066)、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qx201602)、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声音的权威:美国黑人女性小说叙述策略研究”(14YJC752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方小莉(1981—),女,四川西昌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叙述学。四川成都 610065

美国黑人奴隶叙事现如今不仅在美国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也普遍得到重视。奴隶叙事作为一种文类得到学界的关注最早始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该时期,少数学者逐渐意识到奴隶叙事对非裔美国小说创作的决定性影响。自20世纪20年代中页开始,这些学者们开始尝试各种研究,探讨奴隶叙事的文学性。^{[1](P. xii)} 20世纪30年代的联邦作家计划(FWP)采访了美国17个州的2200多名奴隶(ex-slave),产生了16卷奴隶叙事。^{[2](P. 49)} 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资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和经典重构使奴隶叙事自70年代开始逐渐得到各个领域的重视。

198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查尔斯·T·戴维斯(Charles T. Davis)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编辑的《奴隶叙事》(*The Slave's Narrative*)。从广义上来讲,他们将奴隶叙事定义为产生于18—20世纪由奴隶书写或是口述记录的自传性叙事。^{[1](P. 5)} 也即从时间上来说,奴隶叙事包括了内战之前,美国奴隶制存在时期由奴隶书写或是口述的叙事;同时也包括战后,奴隶制被废除后,由这些前奴隶书写或口述的叙事。从媒介上来说,奴隶叙事主要分为口述和书面文体两种类型;从文类来说,奴隶叙事被归类成为拟自传型的叙事。2007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非裔美国奴隶叙事剑桥文学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frican American Slave Narrative*)。这预示着非裔美国奴隶叙事已经成为了一种主要的文

类,巩固了自己在文学经典中的位置,成为了人们阅读和研究绕不开的经典。^{[3](P. 1)}

本文主要从源起、发展、文类、影响等方面,从符号叙述学的角度,试图对奴隶叙事做出相对全面的研究。

一、奴隶叙事的产生与发展

奴隶叙事产生于18世纪,兴盛于19世纪。奴隶叙事是一种目的性明确的文本“最初是试图结束奴隶贩卖,之后是废除殖民地奴隶制(指英属殖民地,如牙买加),最后是废除美国奴隶制”^{[3](P. 2)}。由于历史语境、意图定点不同,不同时期的奴隶叙事书写关注的重点也不同。

18世纪奴隶叙事的产生有其文化与哲学思想背景。首先启蒙主义思想的产生催生了人道主义原则;其次18世纪感伤主义的兴起使同情、仁慈成为了重要的品质;另外随着民主思想的发展,尤其在18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更多地关注人的自然权利。^{[4](P. 11)}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奴隶贩卖成为了一种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权的罪恶活动。因此18世纪的奴隶叙事关注的重点是贩卖奴隶的罪恶。一方面,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认为只要停止了奴隶贩卖,奴隶制就会慢慢消亡。^{[5](P. 7)} 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历史语境的限制,大西洋两岸的废奴主义者只是试图结束奴隶贩卖活动,并不想从根本上根除奴隶制。直到1807年,美国和英国都制止了奴隶贩卖之后,废奴主义者才开始抨击奴隶制本身。^{[6](P. 47)}

18世纪的奴隶叙事可以说是启蒙思想的间接

产物,该时期奴隶叙事的主题是奴役与自由,作者非常关注个人自由的书写。黑人奴隶在非洲的个人经历是奴隶叙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5](P.7)}非洲的经历是黑人奴隶的个人历史,是构成其身份的重要部分。同时,非洲的经历向读者呈现了黑人奴隶曾经的自由生活,也交代了他们如何因罪恶的奴隶贩卖而失去自由。由于对个人经历的强调,该时期的奴隶叙事中宗教与冒险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包括在非洲的经历、自己的各种冒险经历、宗教皈依经历等。这些因素使该时期的奴隶叙事在体裁上也并不固定,人们可以将其当作“自传(autobiography)、宗教皈依叙事(conversion narrative)、犯罪忏悔录(criminal confession)、海上冒险故事(sea adventure story)、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等”^{[4](P.13)}。

19世纪是奴隶叙事的繁荣时期,该时期的奴隶叙事主要是逃亡奴隶叙事。除了公众对奴隶经历的兴趣及欲望不断增长外,奴隶叙事兴盛最主要的原因是废奴运动的发展。由于18世纪美英都禁止了贩奴活动,废奴运动高涨,废奴主义者将抨击目标转向了奴隶制本身,因此该时期的奴隶叙事的意图是废除奴隶制。奴隶叙事在内容、主题、构成要素甚至是体裁归属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内战前的奴隶叙事的焦点直指奴隶制,逐渐变得更为流行,并成为了与奴隶制斗争的有效政治方式。”^{[4](P.12)}

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废奴主义的复兴引起了废奴主义者们对奴隶叙事更多的关注,他们认为奴隶叙事可以为他们赢得公众的支持,因此他们主动寻找并鼓励奴隶进行演讲或书写他们的故事。^{[5](P.8)}经过18世纪的发展,奴隶叙事的影响越来越大。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所罗门·诺斯洛普格(Solomon Northrup)、摩西·罗珀(Moses Roper)、阿奎那(Equiano)、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约西亚·亨森(Josiah Henson)等的奴隶叙事作品在销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影响力大增。^{[1](P.xvi)}在废奴主义者看来,奴隶叙事已经成为了废奴运动中非常重要的武器。同时由于废奴主义运动的支持,又反过来使奴隶叙事的影响及传播更为广泛。19世纪的奴隶叙事应废奴主义者的政治需求,主要关注奴隶制下奴隶所受到的身体伤害和精神虐待。奴隶叙事不再关注个人经历或是对人生的哲学探讨,而是重点书写奴隶制下那些可怕的、耸人听闻的经历。18世纪奴隶叙事中的奴隶个人冒险经历被19世纪的种植园经历取代。

20世纪的联邦作家计划使更多黑人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时期的奴隶叙事主要是通过采

访记录来完成。此时的目的似乎是要将奴隶对过去的回忆作为史实记录下来,成为认识过去的材料。以往留下来的官方历史,大都是从白人的视角来审视美国奴隶制存在时期的历史。由于是采访记录,该时期的奴隶叙事主要采用问答形式,奴隶对自我经历的讲述和回忆,主要受到采访者问题的引导。20世纪的奴隶叙事所涉及的内容相对更为广泛,采访中问题涉及“工作、衣食、宗教、反抗、对生病奴隶的照顾、与奴隶主的关系、内战时期的经历、南方重建时期的经历以及后来的生活模式等等”^{[7](P.43)}。受限于问答形式,黑人在叙述中的主动性也相对减弱,奴隶叙事也失去了18、19世纪的故事连贯性,体裁也发生了变化,从而脱离了文学体裁形式,很难被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

然而,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及各种主客观原因,联邦作家计划虽然成功地让更多黑人发出声音,收录了大量奴隶口述叙事,但这些材料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学界重视,最重要的原因是学界对这些资料的真实性存疑。保罗·斯科特(Paul D. Escott)、C·万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约翰·布拉欣加米(John W. Blassingame)等几位历史学家都撰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总的来说,他们的观点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是真实性问题,质疑年过半百的受访者说出真相的能力;第二是质量问题,怀疑因技术性问题造成采访被扭曲,采访报告质量参差不齐。

通过对奴隶叙事三个阶段的发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奴隶叙事的目的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奴隶叙事的功能也各有不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学界的研究中,奴隶叙事的“真实性”问题一直都是讨论的核心问题。在早期,只有读者相信奴隶叙事是对贩卖奴隶活动和奴隶制的真实描写,奴隶叙事才能成为废奴主义者的有效工具。到了20世纪,奴隶叙事是否具有真实性也决定了该文类是否可以作为历史语料被应用到除了文学以外的其它研究中。因此在奴隶叙事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有人将其归类为自传,即个人历史,也有人将它与其它文学形式归类为虚构性创作。奴隶叙事究竟是纪实型叙述还是虚构型叙述,本文将在下一部分探讨这个问题。

二、奴隶叙事的体裁研究

在戴维斯与盖茨的《奴隶叙事》中,两位学者主要将选编的学术论文划分为两类:其一,作为历史的奴隶叙事;其二,作为文学的奴隶叙事。奴隶叙事现如今不仅作为经典进入了文学研究,同时也作为史料进入了社会学、历史、政治、经济各研究领域。无论是作为历史还是作为文学,奴隶叙

事的“真实性”(authenticity)问题都是备受关注的焦点。这就涉及到奴隶叙事的体裁归属问题:奴隶叙事究竟是纪实型叙述还是虚构型叙述?

由于奴隶叙事产生的特殊社会历史语境,奴隶叙事的目的是要废除奴隶贩卖与奴隶制。对奴隶叙事的讨论,必然要涉及文本意向性的问题。“文本意向性涉及叙述者与受述者的关系。”^[8]奴隶叙事的作者希望读者将奴隶叙事当作纪实型来阅读,只有读者相信作者所说的一切与事实相符,才能达到废奴主义运动的目的。然而奴隶叙事的读者并非都能按照作者的愿望对文本进行阐释。意义的表达和形成总是要受到社会规约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奴隶叙事成为了废奴主义的工具,具有较强的政治宣传性。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使用奴隶叙事,历史上也不乏白人代笔、白人改写的例子,从而让一部分读者,特别奴隶制的拥护者们认为“奴隶叙事不过是小说”^{[9] [P. 14]}。奴隶叙事长期得不到研究者的重视,也是因为其真实性遭到质疑。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关注奴隶叙事的文学性,将奴隶叙事与侦探小说、流浪汉小说、冒险小说等虚构型文类进行比较研究,这使得奴隶叙事的文类归属愈加复杂。

詹姆士·奥尔尼(James Olney)撰文对比了奴隶叙事与欧洲的自传,以及用西方对文学的定义和标准来研究奴隶叙事的文学性。他得出的结论是奴隶叙事既不能被看作是自传,也不能被看作文学。^[10]因为自传出于其体裁要求,是不允许创作的,反过来艺术创作又削弱了文本的真实性,因此奴隶叙事的历史性与文学性从真实性上来讲似乎是相互冲突。

上文中的复杂局面主要是因为学界对体裁的判断一直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有的人是按照作品风格来判断,有的是按照作者意图来判断,有的是按照读者阐释,有的则是按照作品的指称性来判断。由于以上几种方式,都没有一个相对客观的判断标准,因此奴隶叙事的体裁归属则无法确定。事实上按照赵毅衡的“区隔”原理来判断,奴隶叙事的体裁归属则明了许多。奴隶叙事在笔者看来是纪实型的文学艺术作品。

虚构型叙述与纪实型叙述是两种基本的表意方式。“纪实型叙述往往被等同于非文学艺术,而虚构则等同文学艺术。这两对概念有重叠有区别。记录电影、新闻图片、纪念壁雕、广告等往往被看作艺术,却不是虚构。”^{[11] [P. 64]}奴隶叙事也正如这些纪实型艺术创作一样,即是纪实性的又是文学作品。

纪实型叙述(factual narrative)不是对事实的叙述,而是要求叙述的内容有关事实。虚构型叙

述(fictional narrative)不被要求与事实有关,但说出来的却不一定不是事实。18、19世纪的奴隶叙事由于强烈的政治宣传性,从而奴隶叙事被要求必须指称经验事实,因此若出现所谓的“创作”则破坏其真实性。因此从风格上来讲,无论是书面的奴隶叙事,还是奴隶的演讲“越原始,越具有真实性”,因为被艺术加工后就失去了其真实性。

赵毅衡提出纪实型叙述体裁的本质特点在于接收方式的社会文化规定性。虚构型与纪实型叙述的区别,在于文本如何让读者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体裁。^{[11] [P. 72]}赵毅衡提出一度区隔是将经验世界媒介化,也就是用符号再现经验世界。纪实型叙述的叙述者是作者本人,他直接面对的就是现实世界的公众读者,公众读者则有权质疑纪实型叙述的真假,让作者对叙述问责。虚构型叙述则是进入了二度区隔,即对再现的虚构性重塑。虚构型叙述不再是经验的媒介化,而是二度媒介化,经验世界的作者分裂出一个虚构的叙述者,重新建构了一个虚构世界,同时也要求读者分裂出一个虚构的叙述接受者来接受这个叙述。虚构世界不再指称经验世界,因此读者不会要求叙述者对事实问责。^{[11] [P. 76]}

从双层区隔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奴隶叙事是将奴隶的经验世界符号化,再现其奴隶制下的经历。由于奴隶叙事的作者就是奴隶叙事的叙述者,他们直接面对公众读者,因此他们必须对自己叙述的真实性问责。奴隶叙事问世至今,叙述的真实性问题都是各个领域探讨的问题。这也证明了奴隶叙事是与事实有关的体裁,若是属虚构型,叙述者则无需问责。

从奴隶叙事的文本构成来看,奴隶叙事除了正文以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含了大量的伴随文本。这些伴随文本事实上与奴隶叙事的正文处在同一个层面,也被归为了文本的一部分。例如由白人书写的前言或是证词都是奴隶叙事文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这些前言或证词的目的正是为了证明接下来的奴隶讲述的故事是真实的经历。奴隶叙事是对经验世界的符号化的文本,是对经验世界的一次性再现,它属于纪实型叙述。也正是因为其体裁类型要求讲述与事实有关的故事,奴隶叙事叙述者,以及为奴隶叙事写序的白人都被要求对其真实性问责,因为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层次,在一度区隔中共同面对经验世界的读者。

三、奴隶叙事的伴随文本与文本

从上文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奴隶叙事与其它文类一样主要由文本和伴随文本构成。奴隶叙事的伴随文本与正文本身属于同一个层次,重要

性无可置疑。在讨论了奴隶叙事的体裁后,笔者接下来主要介绍奴隶叙事的基本构成。

(一) 奴隶叙事的伴随文本

“伴随文本是落在文本外的记号,它是伴随着一个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伴随文本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这些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影响意义解释。”^{[12](P.141)} 奴隶叙事中包含了大量、丰富的伴随文本,并成为奴隶叙事的体裁标志。

首先“副文本通常落在文本边缘上,可以被称作文本的框架因素,包括书籍的标题、题词、序言、插图、美术的裱装、印鉴等”。^{[12](P.142-143)} 通常的奴隶叙事都会包含一张作者的肖像画,并由其签名,以证明该奴隶确实存在。例如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索吉娜·楚斯(Sojourner Truth)等的作品中都包含了作者的肖像。除画像外,奴隶叙事的标题也非常有特色。奴隶叙事的标题,大都采用XX奴隶的叙事(Narrative)这种模式,提出作者的名字和身份,同时在标题页还会申明,该叙事是由该奴隶亲自书写或是亲自讲述等字样。例如《黑人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生平自述》(*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An American Slave, Written by Himself*)、《西印度奴隶玛丽·普林斯的历史》(*History of Mary Prince, a West Indian Slave related by Herself*)。

奴隶叙事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副文本就是一系列证词,它们以前言(preface)或是导言(introduction)等方式出现。这些前言或导言的作者通常是白人废奴主义者、白人编辑或是白人作家。他们在前言中向读者证明该奴隶确实存在,并担保了奴隶叙述者的人格以及其叙述的准确性,也表明奴隶叙事简单、清楚地描述了事实的原貌,没有经过夸大和想象等。从奴隶叙事的标题和序言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通过标题强调该叙述是出自奴隶本人,还是序言中白人的担保,都是为了强调奴隶叙事的真实性。

此外,奴隶叙事的前文本也是至关重要的伴随文本。“前文本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狭义的前文本包括文本中的各种引文、典故、戏仿、剽窃、暗示等;广义的前文本包括这个文本产生之前的全部文化史。”^{[12](P.145)} 从狭义上来讲,奴隶叙事属于一个独立的文类,它有自己的文类特点,如前面提到的标题、序言等,同时奴隶叙事的正文部分的构成也有规律可寻,因此任何一部奴隶叙事之前的奴隶叙事作品都构成其前文本。从广义上来讲,奴隶叙事产生的整个历史文化语境,如废奴主义运动等

也构成其前文本。这一系列都会影响读者对奴隶叙事的解读。

有些奴隶叙事还包含链文本。链文本是指接收者解释某文本时,主动或被动地与某些文本“链接”起来一同接收的其他文本,例如延伸文本,参考文本,注释说明、网络链接等”^{[12](P.147)}。在一些通过口述记录的奴隶叙事中,我们会看到奴隶叙事的延伸文本或是补充文本,例如有编辑在奴隶叙事文本结束后的信息补充。索吉娜·楚斯的奴隶叙事是由她口述,由一个白人记录者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来讲述的。这位白人叙述者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不断加入注解说明,印证索吉娜的叙述的真实性。同时在叙述完后,有的版本还附上了楚斯周围的人对其生平的见证、书信来往等史料。^[13]这些都成为了奴隶叙事真实可靠的佐证。

可见奴隶叙事有着丰富的伴随文本,伴随文本不仅标示出了奴隶叙事的体裁归属,同时通过对伴随文本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到奴隶叙事中“真实性”的重要性,因为各种伴随文本都是为了证明奴隶叙事的真实性。由于这些伴随文本的重要性,从而成为阐释文本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已经完全融入了文本,因此就与文本构成了全文本。在讨论完伴随文本后,笔者将继续讨论奴隶叙事文本的主要特点。

(二) 奴隶叙事文本

奴隶叙事由于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应废奴运动的发展而生,其意图定点明确,政治宣传目的性较强,因此大多数的奴隶叙事都包含了类似的因素。该部分主要从叙述者、受述者以及情节编排三方面来探讨奴隶叙事文本的基本结构。

(三) 叙述者与受述者

在奴隶叙事文本中,通常叙述声音与叙述视角都统一在文本的主角——奴隶身上。奴隶叙事主要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由逃亡的奴隶或是获得自由的奴隶从现在的视角来回顾过去奴隶制下的悲惨生活。

奴隶叙事之所以采用第一人称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首先奴隶叙事的作者是应废奴主义者的要求而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因为用第一人称讲述可以向读者显示,奴隶叙事的资料是第一手资料,因为是由亲身经历过奴隶制的奴隶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另外由奴隶制的受害者亲自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更能做到以情动人,这样可以呼吁更多的人支持废奴运动。

在讨论伴随文本时,我们知道奴隶叙事中的前言主要由白人撰写,目的是担保奴隶叙述的真实性。在一个黑人的存在、人性、知识背景等都遭到质疑的时代,白人的担保成为了奴隶叙事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序言与奴隶叙事文本成为无法分割的全文本。这使得奴隶叙事的叙述者和视角变得复杂。

在奴隶叙事中,读者在听到奴隶叙述者的声音之前,首先听到了序言中白人叙述者的声音。虽然在大多数文本中,这个声音随着正文的开始退出文本,但是叙述者的讲述却无法摆脱白人的影响。首先当时几乎所有的奴隶叙事都受到白人的赞助,白人为了让奴隶叙事对废奴主义运动有积极影响,他们对奴隶叙事的内容、主题、结构甚至是讲述方式都会产生影响。当然有的奴隶叙事本身就是经过白人的重新编辑、加注等才面世的。对于口头叙述记录的奴隶叙事来说,这样的情况更微妙。因为白人抄录者不可能逐字记录,他们会从自己的视角来编辑奴隶的故事。甚至还有奴隶叙事更像是奴隶的传记,是由白人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听到的奴隶的故事,典型的例子是《索吉娜·楚斯自述》(*The Narrative of Sojourner Truth*)。总之,奴隶叙事试图将奴隶制的受害者——奴隶叙事的叙述者人性化,并将其刻画成为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在寻求自己应得的自由。^{[5] (P. 13)}

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得奴隶叙事的目标受众相对明确。废奴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废除奴隶制。而奴隶叙事的作用是帮助白人废奴主义者赢得更多的支持。废奴主义者认为将奴隶人性化,描写黑暗、残酷的奴隶制,揭露奴隶主对奴隶的奴役就可以为他们赢得更多的支持。显然奴隶叙事的目标受众是那些可以被争取的白人受众,特别是美国北方的白人。“废奴主义者们的目标是赢得北方白人的支持。南方的白人并没有被预设为反奴隶制活动的潜在观众。因为南部的人即使意识到奴隶制的不公平,但是南部整个经济体制的维系必须要有大量的奴隶劳工。而北方的白人因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因此可以从情感和道义上说服并争取到他们的支持。”^{[5] (P. 13)}

可见奴隶叙述者一方面受到废奴主义者的约束和监管,另一方面又要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读者的特殊身份,因此叙述者对故事的讲述非常不自由。由于各种限制,虽然奴隶叙事的叙述者讲述了各自的经历和故事,但是他们所讲的故事包含了很多该文类的相似点,这也是历史的选择。

(四) 情节编排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奴隶叙事的作者并不能完全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故事,呈现自己的经历,而是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奴隶叙事因废奴运动的发展而兴盛,目的是要为废奴运动服务,因此奴隶叙事中奴隶的经历被要求围绕奴隶制呈现。

奴隶叙事通常都是以介绍奴隶的基本情况开场,包括奴隶的出生时间与地点,通常时间不详,地点却很精确,父母的情况也是个难解的问题,往往会暗示父辈是白人或有白人血统。在交代完基本情况后,奴隶叙事就转向了外部情况,主要是书写无情的奴隶主、奴隶生存的各种危险、通过奴隶拍卖场景的描写来展示奴隶生活的不确定性、奴隶获得教育过程中的限制和障碍、奴隶逃亡的各种努力、奴隶对奴隶制的反思等等。^{[5] (P. 16-17)}

奴隶叙事大部分的情节都围绕奴隶制展开,目的是为了揭露奴隶主和奴隶制的罪恶,展示奴隶在奴隶制下的悲惨命运以及对自由的渴望,从而说服北方的潜在受众拥护废奴主义运动。由于这种强烈的政治需求,叙述者讲述自己生活的空间被无限压缩,成为了对外部奴隶制世界描写的附庸物。虽然如此,奴隶们毕竟在这个白人的主流文化中,开始用自己的声音讲述故事,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奴隶叙事的作用及影响

黑人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性,奴隶叙事最直接的功能就是作为废奴主义者的工具,为废奴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奴隶制的废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小迪金森·布鲁斯(Dickson D. Bruce, Jr.)认为奴隶叙事为废奴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战前有关奴隶制的论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奴隶叙事在战前还有助于推进美国的民主进程。最后奴隶叙事推动了自由思想的传播,让其得到更多人的重视。^{[14] (P. 29)}

奴隶叙事现如今已成为了珍贵的史料,被应用到各个领域的研究中。在奴隶制废除后,人们得以从奴隶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美国这段历史。官方的历史只是从白人视角有选择地呈现了美国奴隶制时期的这段历史。奴隶叙事得到重视,奴隶获得机会从他们的视角,用自己的声音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从而让人们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美国历史。他们书写的历史不仅补充了美国的官方史,同时也与白人书写的历史形成协商、恢复和找回被主流历史抹去的记忆。同时,非裔美国人这个被认为没有历史的民族,也通过对个人史的书写,汇聚成为民族史,让非裔民族的这段重要的过去没有成为空白,而是有史为证,有史可考。

美国黑人民族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因此其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民族存在、发展及兴亡的重任。奴隶叙事是黑人文学的源头,它现如今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类,从而丰富了美国文学及世界文学。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奴隶叙事才是具有美国独特特色的文学形式,因为美国文学中

其它的文类都源自欧洲。作为非裔美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是源头,奴隶叙事通过创作证明了非裔美国人的存在和人性。

在美国蓄奴制时期,奴隶被降低到生物性,成为了牛马一般的财产,他们被剥夺了作为人的自由,人性也得不到承认。在西方的传统中,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培根认为可以用是否能够从事艺术创作来区分有色人种。言下之意就是说有色人种无法从事艺术创作。之后彼得·海林(Peter Heylyn)认为黑人不具备人性(sub-human),他认为黑人完全缺乏人类具有的理性,他们缺乏智慧,不懂艺术与科学。后来的康德也认为美国印第安人和黑人在智力上比其他种人低下。^[1] P. xxvi - xxviii) 奴隶叙事的诞生正是非裔美国民族通过文学创作证明自己作为人的本体存在。他们在美国文学发展的初期,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特殊文类,成为了当今无可否认的文学经典,并对欧洲和美国后来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奴隶叙事融合了该时期各种文学形式的特点,如侦探小说、流浪汉小说、感伤主义小说、冒险小说等,用于讲述非裔美国人独特的人生经历。这种文学形式不仅影响了后来的非裔美国作家,也影响了欧洲及美国的主流作家。

据考证,奴隶叙事影响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很多小说家,其中包括狄更斯、夏洛蒂·勃朗特等知名作家。狄更斯在1848年3月写给朋友的信中推荐了道格拉斯,他后来的作品也可以看出奴隶叙事的影响。朱丽(Julia Sun - Joo Lee)认为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运用奴隶叙事的模式来讲述了皮普从一个契约学徒转变成为一个绅士的故事。除此之外,美国奴隶叙事还在主题、内容和结构等方面影响了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及伊丽莎白·加斯克尔的相关作品,如《灰色女人》(The Grey Women)。^[9] P. 115)

奴隶叙事对美国作家的影响更为普遍。据说斯托夫人在写作《汤姆叔叔的小屋》时就受到了奴隶叙事的影响,她对汤姆的人物塑造和小说情节的发展均借用了约西亚·亨森(Josiah Hensen)的叙事。《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后,人们甚至直接将约西亚·亨森等同于汤姆叔叔。^[15] P. 114) 奴隶叙事对非裔美国小说家的影响更是比比皆是,如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的《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理查德·赖特的(Richard Wright)《黑孩子》(Black Boy)、依什梅尔·瑞德(Ishmael Reed)的《逃向加拿大》(Flight to Canada)、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宠

儿》(Beloved)、盖尔·琼斯(Gayl Jones)的《克瑞格·多拉》(Corregidorra)、雪莉·安·威廉斯(Sherley Ann Williams)的《戴莎·罗斯》(Dessa Rose)等,例子举不胜举。

可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美国奴隶叙事在政治、历史、文学方面的影响都非常突出。时至今日,奴隶叙事不仅得到文学家、历史学家的关注,同时也进入了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艺术家、音乐理论家、社会学家等的研究领域,成为了无可否认的经典。

参考文献:

- [1] Davis, Charles T. & Gates, Henry Louis Jr. *The Slave's Narra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2] Woodward, C. Vann. "History from Slave Sources". *The Slave's Narrative*. ed. Charles T. Davis & Henry Louis Gates J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 Fisch, Audrey A.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frican American Slave Narra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4] Gould, Philip. "The Rise, Development, and Circulation of the Slave Narrativ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frican American Slave Narrative*. Ed. Audrey A. Fis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 Sterling Lecater Bland, Jr. *African American Slave Narratives: an Antholog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1.
- [6] Carretta, Vincent. "Olaudah Equiano: African British Abolitionist and Founder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Slave Narrativ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frican American Slave Narrative*. Ed. Audrey A. Fis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7] Escott, Paul D. *The Art and Science of Reading WPA Slave Narratives*. *The Slave's Narrative*. ed. Charles T. Davis & Henry Louis Gates J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8] 金小天. Narratology Version III: A Review of Zhao Yiheng's A General Narratology [J]. 符号与传媒, 2014(9).
- [9] Lee, Julia Sun - Joo. *The American Slave Narrative and the Victorian Nove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0] Olney, James. " 'I Was Born': Slave Narratives, Their Status as Autobiography and as Literature". *Callaloo*, No. 2(Winter, 1984).
- [11]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 [12]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3] Truth, Sojourner. *Narrative of Sojourner Truth*,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Nell Irvin Painter.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8.
- [14] Bruce, Dickson D. Jr. "Politic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Slave Narrativ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frican American Slave Narrative*. Ed. Audrey A. Fis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5] Winks, Robin W. *The Making of a Fugitive - Slave Narrative: Josiah Hensen and Uncle Tom - A Case Study*. *The Slave's Narrative*. ed. Charles T. Davis & Henry Louis Gates J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收稿日期 2016-05-10 责任编辑 申燕